

本刊自2014年開始，增多「學術論文」欄目的篇幅，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編者

阿勒瑪斯的「三本書」

維吾爾族作家阿勒瑪斯的三本書《匈奴簡史》、《維吾爾古代文學》、《維吾爾人》一直被當作宣揚分離主義意識而被批判。姚新勇的〈「大維吾爾文明」的穿越抑或建構？——吐爾貢·阿勒瑪斯的「三本書」及其批判〉（《二十一世紀》2014年10月號）一文，對我們理解部分維吾爾族知識界人士如何敘述自身民族歷史，功莫大焉。

阿勒瑪斯的三本書是典型的民族主義敘事。正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指出的那樣，這種將民族的歷史追溯到傳說中的遙遠的過去是為典型的民族國家表述方式，但弔詭的是，也成為了國家境內非主體民族的權利訴求和表達的方法，也是分離主義者尋求其合法性所慣用的。「三本書」就是這樣一種表達，其邏輯、結構與手法與民族國家的敘事毫無二致。當然，這類表達無法代表民眾的意見，但是所有的分離主義者和族群性認同政治的活動家，都聲稱自己代表着本群體廣大民眾的利益。

姚新勇正確地勾勒了阿勒瑪斯的作業方式：「以匈奴為緯」，「以突厥為經」，在廣袤的時空範圍內將史料信手拈來，信口開河，東拼西湊，以描繪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出維吾爾族生存發展的宏偉畫卷。這種做法無非代表了一種「爭奪文化領導權的博弈」。

走筆至此，我們應當思考，為甚麼會有這三本書？是甚麼原因促使這麼一個人寫這麼三本書？國家固有的表述方式是否是個刺激？新疆目前這種令人不安的狀況在多大程度上是治理上失誤？而「三種勢力」又在多大程度上成為問題的藉口？姚新勇的思路無疑是對的，只有客觀、平等、寬容地看待相關現象，才有助於真正理解新疆問題的實質所在。

范可 南京

2014.11.7

建國初期無照攤販的治理

「城管」，在中國大陸幾乎是人所共知的一個詞彙，近年更引起公眾的關注和熱議。任偉的〈中共新政權與底層百姓的互動磨合——新中國初期北京整治無照攤販〉（《二十一世紀》2014年10月號）一文，雖然是以1950年代初期的北京為研究對象，但是對於理解當下的「城管」問題不無啟發意義。

該文指出，無照攤販雖然佔道、不衛生、所售貨品質量難以保證，但因便於購買、價格低廉、迎合需求，所以受到低收入居民的歡迎。這種買賣關係的形成，是以簡單供需為基礎的，與是否接受政府管理無關。這是整治無照攤販難以短時間收效的原因所在。該文並未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次上，而是以小見大地論及重本抑末思想的殘留、意識形態的工具化、勞動觀念的歧異等，給人印象深刻。

如作者所示，北京整治無照攤販，不僅為了整頓交通、美化市容，更有控制邊緣社會、減少城市用糧、保障社會穩定的深意。然而，規訓無照攤販、遣送青壯「逃京難民」出城，是否意味着中共疏離了「貧苦大眾」並「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建國後的壓縮城市人口、工農業剪刀差等，更多地與國家通過農業積累完成工業化的經濟戰略有關。此外，從抗戰時期黨內稱中共是「半個執政黨」開始，到文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提出，再到改革開放多年後重提執政黨建設，說明中共認識自我的艱難與曲折。將中共在「革命

黨」與「執政黨」自我定位的認識簡單化，可能並不符合歷史的複雜多變。

李秉奎 北京
2014.10.23

香港身份認同的異質性

袁夢倩的〈創傷書寫、香港身份認同與國族寓言——重讀香港電影《棋王》〉（《二十一世紀》2014年10月號）一文，通過對香港電影《棋王》文本的再解讀，以梳理香港身份認同與國族寓言這一宏大命題。作者提出，「九七」和「六四」是影響香港身份認同的關鍵事件，兩者共同激發起香港集體潛意識中對於北京的恐懼情緒，並導致九七回歸後香港主體性發酵出新的語境（城邦自治）和抗爭運動（佔中運動）。這樣的觀察是中肯的。

香港今日諸多政治困局的問題癥結，必須追本溯源到1989年那一場巨大的政治衝擊波，一方面促使香港民眾在政黨的認同上與北京愈來愈疏遠，不信任中央政府，並在今天發展成為只要是來自於內地的就反對，以及凡是和黨派有細微聯繫的就反對等一系列極端的情緒；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央政府愈發依賴本土商界精英，希望通過拓展香港的政商聯盟以增強特區政府的管治效力。

必須指出，香港身份認同始終是一種動態、非線性的發展。作者對此雖有提及但並未作進一步的闡釋。1980年代伴隨着香港經濟騰飛，香港意識開始出現，並在與內地貧窮落後的形象對比中顯得高高在上；1989年之後，香港的政黨政治起步，民主訴求開始發

酵；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一直到2003年開放自由行，本土性並未有完全覺醒；開放自由行的十年裏，伴隨着內地資本的湧入，兩地摩擦加劇，加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控制愈加收緊，香港意識中對抗的力度空前加大，對於國族的認同降至最低點。佔中運動之後，香港意識開始呈現分裂主義趨向，對於社會秩序的共識已蕩然無存。這種新的變化未來會產生何種影響，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但毋庸置疑，誠如作者所言，「香港身份認同是複雜的、異質性的」。

嚴飛 舊金山
2014.10.23

單薄論證，語焉不詳

王英的〈無奈的表演：土地改革中的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2014年10月號）一文記述了建國初期知識份子對於土改的態度，從知識份子的視野去描述共和國早期的歷史，探討知識份子在土改中的表現是怎樣建構了新政權的認同感。該文立意很好，但有個別問題值得商榷。

作者預設了這樣一個觀點：知識份子出於自保或為了獲得政治上的好處，對於土改運動持一種曖昧配合的態度。在作者看來，知識份子在行動和言語上對土改的支持，實質上都是一種政治表演，其背後有着各種各樣的目的。但作者沒能形成足夠完善的體系來支撐其論點。作者雖然強調運用田野調查研究，但被訪者只有四人，數量不足以說明問題。尤其是將對劉玉芬的訪談單列一節，以劉的個案解釋為一類

知識份子群體，論證未免過於單薄，缺乏足夠說服力。此外，作者引用一些知識份子小說、回憶錄等來論述他們對土改的看法，但引用內容語焉不詳，未能真切反映問題。

霍炫吉 南京
2014.10.22

學人心地貴無邪

讀罷〈憲政成敗的衡量標準與世界趨勢〉（《二十一世紀》2014年10月號）一文，兩位學者求真務實、嚴謹細緻的學術作風，令筆者十分敬佩。

「實行了民主好處多」，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著名紅歌中的一句詞。當初共產黨鬧革命，為了發動群眾爭取民心，曾稱是為了爭取自由民主，解放全中國。毋庸諱言，共產黨在革命勝利後，有違背當年爭民主、求解放的承諾。更令人遺憾的是，理應以闡發和倡導真理道義為己任的學者，竟稱中國不能搞憲政。相形之下，張千帆、陸符嘉兩學者關於憲政的這篇文章，採用「世界銀行」、「經濟學人智庫」、「無國界記者」等具有顯著公信力的調查統計結果，以圖表和數據，將經濟發展與法治、民主、新聞自由的關聯性以及憲政三維指標內在的關聯性等，做了十分有力的表述。儘管論證憲政的角度和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但這種以圖表和數據等事實的論證，確實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徐佩興 紹興
2014.11.3